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五辑)

总主编/李玉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基人——王瑶

张中伟
张中儒
/ 著



王瑶——中国当代杰出的现代文学史奠基人。他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因为他曾拥有过丰富的世界，无愧于自己平生的执著追求，赋予神圣文化的生命，使学术的光辉照亮了历史的长河之水。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5辑)

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基人——王瑶

张中伟 张中儒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7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60-6

G·2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青少年时期	(1)
二、大学春秋	(7)
三、学者之路	(12)
四、奠基之作：《中古文学史论》	(16)
五、《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及其命运	(20)
六、文革岁月	(27)
七、鲁迅研究及其他	(33)
八、壮心不已的晚年	(37)
九、最后的微笑	(42)
十、尾 声	(45)

引 子

他无憾于自己的一生，因为他曾拥有过丰富的世界。他也无愧于自己平生的执著追求，因为他曾赋予神圣的文化以生命，使学术的光辉承照了历史的长河之水。

他——这位衣着朴素，平生只与一只心爱的大烟斗形影相伴，让凝重的思维在烟雾中变得清彻，变得敏锐，变得条理分明，而后迸放出熠熠闪烁思想火花的人，为了心底清洁的挚爱，甘愿为文史艺术的发扬光大而终生奋斗。

于是，历史文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的阐释与传播，而充满了生命与力量；艺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的捍卫与献身，而显得至圣至洁，光芒四射。

这个人，就是中国当代杰出的现代文学史奠基人——王瑶先生。

一、青少年时期

平遥古城，这是一座曾以票号的创建而使晋商走向顶峰，誉满华夏，继而又使自己梅开二度，日后挺进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特殊的城池。

在距这座著名古县城北约10公里的平原上，一个名叫道备村的地方，1914年的炎夏，村庄以一副默然的心态，接

纳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新诞生的婴儿，就是王瑶。

这一年是民国3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票号界的开山鼻祖，风行了一个多世纪，在当时全国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平遥日昌升票号宣告破产。当然，在此前后，曾经威震华夏的晋商大军，也差不多全军溃败，皆席卷般败回故里。

当年“桐叶封地”的三晋大地，此时已完全进入了军阀阎锡山统治时代。此时华夏各地的军阀们，则在商旅中断，金融死滞的情况下，全都在为了疆域与极权，甚至是为了鸦片和税收，真刀真枪地相互厮杀。什么天理人心，什么国计民生，什么民族的命运……在这些人的心中都认为是废话。战火不息是乱世枭雄的乐园，但殃及池鱼的是社会上最下层的无辜民众。

票号垮了，覆巢之下，在号中做事的王瑶的父亲王惠然也只能回归故土，无奈地闲置家中……

俗谚说：“三十无子半世穷，四十无子绝断根。”中国有传统的“养儿防老”的习惯，所以，当王瑶那年出生的时候，因为其父王惠然已43岁，且还有一位已经9岁的大儿子王璘，其防老已关系不大，唯剩下延续后代了。所以其父王惠然对王瑶的出世是一句慈祥亲谑的感叹语：“秋后的瓜，没有用处的。”

对于自己的父亲，王瑶在《守制杂记》中这样回忆道：

……他是一个由极端贫困中挣扎出来，事实上已只能止于小康，而自己却还不想中止的人。幼年时只读过一年书，从16岁起，就做了佃农和挑

扁担的小贩；祖父终年卧病，他是长子，逼迫着负担起全家生活的担子。以后由挑贩瓷器而到瓷器铺当学徒，又辗转至布店钱庄，而且进入了山西的票号。这过程的变化全是他自己摸索交际的，并没有特殊的关系的援引。慢慢地，他已自修得可以写信打算盘；到入票号时，已可管理账目了。但一直到民国初年票号倒闭，他虽然已经40岁，但还只是赚身金的店员，并没有熬到可以分红利的“身股”。所以当票号倒闭后，他失了业，这时祖父死了，我这“秋瓜”也出生了。

这便是王瑶出生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当时，满清王朝崩溃，民国初建。晋商已全线溃败，作为日升昌票号中一位伙友的父亲王惠然，只好回到故乡道备村中，守着只能种高粱的10亩薄田，过一种自耕农的生活。

王瑶3岁那年，为了生计，其父离家到达原在票号时服务过的地方——河南清华，在一家制造蛋白的工厂里做事，一直到60岁。在此期间家中事务只能全由母亲承担。

8岁那年，王瑶开始在村中上初级小学。那时，课本选用的除商务印书馆出的浅近的文言读本外，还有的便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启蒙课本。当时的小学校，在村东的关帝庙中。关帝庙对面有一个不大的场院，还有一个戏台，逢年过节时，可在这里看戏。他的初小学业便是在这里完成的。

幼年时的王瑶，在初小时便显示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其他小学生对蒙学中的《三字经》、《幼学琼林》、《千字文》等，一提熟读硬背便搔耳挠头，可他却对

此津津乐道,乐意接受。因为他那颗小小的心,十分惊奇于这些书是怎么编出来的,能把上下几千年的事与社会上各种丰富的知识包罗殆尽,编了个工工整整,清清楚楚。他觉得这些书应该是神通广大的神仙编的。背熟它不仅是一种智慧的积累,还有一种美的感受。所以在小学校中,他的成绩最好,并受到老师的赞赏。

与此同时,他还不仅爱听老人们谈论一些古代评书,而且小小年纪便成了一个戏迷。由于他非常认真地翻阅一些家藏的书籍,所以,对评书中的一些人物事件等在断代上有一种清晰的思路。有时,他还对大人们提及的历史人物出现时空错位现象,进行认真的争论,并且决不退让。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书本知识在撑腰,而不是道听途说。

13岁那年,他进入平遥城内第一高级小学就读。该校在城隍庙街南侧的文庙内。大成殿作为祭孔的殿宇,巍峨地耸立在庙院的中心。

当时,他的兄长王璘已中学毕业,进入阎锡山在太原开办的山西省银行当办事员。由于工作能力出色,颇得上司青睐,收入也丰厚。王瑶的家庭也开始富裕起来了。确实,大哥对他日后在求学路上的经济上的资助,是他在学业上有所突破的首要条件。否则,一位出自穷乡僻野的农家子弟,又是身处于那种蛮荒一片的落后的旧时代,是绝不可能在日后的岁月里,登上一种学术的最高殿堂的。

当然,这县城的第一高级小学中的国文老师,其学识与素质就非同一般了。在这里,眼界为之大开的王瑶,遇见了一位姓梁的举人出身的先生,他的心灵出现了首次震动。

梁先生博古通今，口才动人，行止洒脱，热情随和。他的国文课是王瑶最为喜欢的。那时候，王瑶觉得，梁先生无论谈到什么问题，都有引人入胜的魅力，再加之恰如其分地对名言掌故加以引申并借题发挥，使课文变得血肉丰润，充满哲理而熠熠生辉。广博的引经据典确是一种妙不可言的艺术。梁先生的肚子里所存蓄的不仅仅是无限的学问，分明是一座宝库。那时，他常常这样梦想着，啥时候自己也能装下这么一肚子的学问！

与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一样，梁先生对古代圣贤都极为推崇。

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卷帙浩繁，其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则为百家争鸣时期的春秋战国。在那个时期，影响广泛的有玄秘的《易经》，老子的《道德经》，有以阐述战略战术的兵书《孙子兵法》，还有《论语》、《孟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不过，梁先生最为推崇的名家是庄子。

在一次课堂上，梁先生给学生们讲到了治学的重要性，他这样讲道：“人生中最珍贵、最高尚、最美好的东西，既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强权政治只能显赫一时，眩目的财富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英雄可以由时势造出来，万贯家私可以凭机遇而获得。譬如说吧，一个人出身高层家庭便可以得到江山，或成为富翁。可是，这些东西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在这个社会上唯一能永恒地流传下去的，永远地闪耀着的是文学艺术。拥有神圣学问的人，永远是世人由衷地敬慕与信仰的人。但是，丰富的学问并不是轻轻松松便能获取的东西，它需你不断地追求、积累，甚至靠思想的过滤与升华来

完成。其过程是极其艰辛的。但是，一旦你拥有了深厚的学问，则人世上的一切便会在你眼中变得美妙而又神奇。人生中精神上最大的快慰并不是吃到什么，穿到什么，而是一种对艺术创造成功后的喜悦”。

说到了这里，梁先生谈到了庄周，此时他的兴趣极为高涨，在没有课本的情况下，凭记忆而全文畅述了庄子的名篇《逍遥游》。

这一堂对《逍遥游》的发挥，梁先生口角生风，神采飞扬，瑞潭飞瀑，海阔天高。《逍遥游》中那种融于博大精深的寓言中的“小大之辨”，那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把王瑶的心彻底地给镇住了，也迷住了。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学问的广博性与伟大性。拥有了学问真是一种至上的幸福。

这堂课，使班里的学生的情绪都很激动。但王瑶却只是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事实上，他也很激动。但他只是将火种埋在了心底。

显而易见，梁先生的这节《逍遥游》，对于王瑶日后发愤求学，溯古览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一种将来凭渊博的学问立身于世的抱负，使他养成了无论身处何境，都是以书作伴的习惯。当然，他自己也深深地知道，这种抱负绝不是世俗人眼中的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功利思想。这该是一种对人生品位上的自我完善与神圣塑造。

15岁那年，他考入太原市进山中学念初中。在这里，他极其喜读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17岁那年，已经初中三年级的王瑶，奉父母之命，回乡

与平遥城内毋姓之女毋耀俊结婚成亲。婚毕他便迅即返校，不误学业。此时，他的故乡的家庭状况是：父亲因病已由河南退职归家，而家境则由于大哥王璘的工作实绩骄人，而变得丰裕。乡间有了一处三进院的房舍，田产也多了起来。同时有了雇工，置了车马，成为当地的一个小地主了。

18岁的王瑶初中毕业后，他随即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不过，因为其学费太昂贵，只上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他便又转回进山中学学习了。

20岁时，即1933年9月，王瑶高中毕业后，很快便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大学春秋

清华学校，座落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这所学校创办于清王朝的最后一年——1911年。在当时来讲，清华大学的中文系，重要的一点，便是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这所学校确立的办学方针是：中西贯通，古今融汇。它把西方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列为学生的必修课。1934年到1937年间，在这里执教的朱自清先生曾经开设了《陶渊明研究》及《中国文学批评》等课程。不过，新入学的中国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主要以《庄子》、《文选》、《论语》、《孟子》等为主。

与其他院校相比，清华大学的中文系集中了一批全国首屈一指的著名学者，其中就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王力等。在学术上显示出了一种严谨缜密，开拓创新的生机勃

勃的态势。同时,这儿也成了一块可供古典文学研究者耕耘的圣土。

王瑶进入清华的那一年,清华大学全校共录取新生370名,王瑶的成绩是第80名,而中文系才仅录取了9名学生。

进入学校后,系中原先计划的《新文学研究》和习作课,不知何故被取消,王瑶曾对此感到失望,但系中其他代课教授知识渊博的教学使深深感受到自己确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当然,在教授中,他最崇拜的是朱自清与闻一多。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东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1921年1月参加文学研究会,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后留学英国。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还任过《文学季刊》和《太白》杂志编辑。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48年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因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后英勇壮烈,绝食就义。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家骅,字友三,湖北浠水人。著名诗人兼学者。曾留学美国学习美术和文学。后来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抗战期间在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委员。抗战胜利后,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9年,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篇章《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显而易见,有这样的导师引导,王瑶的进步思想的确
定,是十分自然的事。

当然,清华大学的这种优越而浓郁的学习氛围,良师的
指导,对于王瑶的学业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益处的。与王
瑶一起的大学时代的同窗学友赵俪生,在一篇纪念文章《宛
在的音容》中,提到了当时的学习情况时这样写道:

自34年至于37年,首尾四年。那时候,我们一
起到教室听课,一起到大食堂或小饭铺吃饭,一起
到琉璃厂买旧书或到北京饭店校下法文图书公司
买外版书,一起在城内大街上游行示威,一起组织
会社,编刊物,写文章。那时,我们一伙青年朋友们
自发地各有所好,各有所趋,有的写小说和报告文
学,有的写诗或散文诗,有的搞翻译。王瑶兄一直
喜爱并写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因
此,我们私下里对他有“小周扬”和“小胡风”这样
的称号。

通过上面的一段回忆可以看出,王瑶在其求学过程中,
不是仅仅地局限于闭门读书,而是进步的思想也在支配着
他的人生。

因为有了知识,眼界便开阔起来,心灵异常悸动,思维
也异常敏锐,对社会环境的反应也就超于常人。于是,正义
者的热血便常常沸涌,变得不安分起来;而奸邪者则反之,
其紧锁的胸扉愈加灰暗无比,出击的手段也异常阴狠。

所以,撇开在其位谋其政的官仕不说,无论何时何地,
关注国事与时事,并对此作出相关反应的人,往往最先是知

识分子与青年学生。

事实上,早在王瑶上中学时期,正是大革命失败之后,有许多从革命战线撤退下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当了中学教员;其时,校园内那些传播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和左翼文学的书籍也非常流行。所以,王瑶其实很早便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早在高二阶段,王瑶便在暑假期间离开了太原,到达张家口,准备参加抗日同盟军。结果考中了军政人员短期训练班,随之分配到了第六军。半月后,部队又改编为第29军,改编过程中允许自愿离开,并发给遣散费。王瑶因仍想念书,便拿到遣散费又考入张家口察哈尔第一高级中学高三年级学习。

从1934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意图愈加明显,华北形势日趋险恶,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已暴露无遗,全国的抗日爱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国难当头之际,王瑶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清华园里进步组织“左联”小组,并成为骨干分子。自1936年起,他又担任了《清华周刊》第45卷主编。他利用这一舆论阵地,写了许多时事评论与进步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5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12月9日,王瑶与他的导师朱自清及清华大学的学生一道,进行了反对华北自治的抗日救亡大游行。游行时在与挥刀舞棒的军警的冲突中,他还受了轻伤。

随之,学生郭清因参加游行被军警抓捕后死于刑讯。王瑶后又参加了抬棺游行示威。他为此也遭当局逮捕,投入狱中。两星期后,被释放回校。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最重要的方面，还是体现在文艺理论上。在《清华周刊》第45卷上，王瑶便以一种凝重的悲哀撰写了《悼鲁迅先生》一文。文中对“鲁迅精神”进行了阐释。从中可以看出早在青年时期，王瑶便开始了对鲁迅的深入研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想确实深深地影响着王瑶一生的治学道路。

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王瑶忽然离开清华回归故乡平遥。究其原因，据密友赵俪生日后回忆时说：

在他（王瑶）手中，《清华周刊》被教务长先生勒令停刊，使他的情绪受到了打击，此其原因之一。当时的革命，虽然瓦窑堡精神已经下达，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讲的，左倾关门主义仍很严重，组织对成员的看法有时很片面，有时也引起成员对基层组织有看法，此其二。王瑶兄在爱情上也遭挫折，此其三。

当时实际情况大体如下：

6月下旬清华大考完毕，暑假开始，王瑶便向党的负责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赵德尊请假回到了山西平遥老家道备村。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入侵华北，29日北平沦陷。11月太原沦陷。

此时，王瑶接到在武汉的赵德尊来信，又接到清华大学让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的通知。在此期间，他也积极谋求离开这沦陷地，或因父亲不给路费，或因在半途中被溃兵洗劫了全身，又原途折

未回，故终未成行。

总之，这段时间，他基本上是在故乡道备村开始过一个平民的生活。

三、学者之路

人生的历程就像淌流的河水一样，有时径直向前，有时迂回曲折；有时轻波静潭，有时急流飞瀑。那种社会上的动荡风云所形成的压力环境，那种情绪波动的不确定性，还有种种的传统的阻力因素，都无可抹煞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事业进程，使轨痕变得曲折绵长。不过，换一种意义来说，这也是悲喜人生的另一种涵义。

事实上，随着太原的沦陷，晋中平原也沦落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王瑶被困窘在了故乡平遥，其学习生涯终于暂时中止，成为普通平民中的一员。

在写于1942年的《坎坷略记》中，王瑶很简单地这样记载道：

自民国二十六年事变以来，余即蜚居家中，虽亦不无波浪，但大体言之，均属平淡。三十年春，即前一年，余仍亟亟于商业生利，盖系为家庭服务性质，一方亦生活逼迫使然，故亦津津乐为也。元宵节前，即与耀俊进城，畅玩数日，一方仍从事纸烟、皮烟等货物之购置，后遂归村。

由于王瑶出行未成，困居家中，兄长王璘为安全起见，

遂在村内开设了一个卖油盐酱醋的小铺。王瑶则由清华大学的一名高材生，蜕变为记帐卖东西的小老板了。

这期间，他的妻子毋耀俊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超鲁。后又生了两女，皆襁褓中夭亡。

对于一个乡间平民来说，娶妻生子，挣钱谋生，将小日子装点得和和美，则是一件既天经地义，又其乐无穷的人生快事。田园生活虽说有点超脱的魅力，但真的与创作与探索相脱节的话，对于一个有志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是悲哀的。所以对于王瑶来说，虽然此段时期在享受着常人该享受的一点人生乐趣，但顿然间让他远离文化氛围的熏陶，使心灵失落在生活的琐事中不能自拔，无异于是一种精神的熬煎。因为他的思想应该停留在一种深刻的文化上，而不是油盐酱醋的斤斤计较上。

随之，生活琐事中的一些烦心的事使他对这种生活感到很无奈。

先是因为他思想进步，与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组织联系密切，使他成为当时日军搜捕的对象。后经他与日军便衣巧妙周旋，方解除警报。而后，便是他为自己为自己在城内购得一处房产，把积蓄差不多全部消耗殆尽，以至引起了全家的埋怨，使他感到极其苦闷。

于是出走的念头日益滋长。

终于在1941年9月，他离开故土。先到达孝义县城，脱离了日伪的统治区。后辗转到达西安。此时，他闻知昔日的同窗好友赵俪生及其夫人在陕西乾州中学教书，便前去相访。当时，赵俪生夫妇的生活处境也很艰难，兵荒马乱的年